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建筑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第一辑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76209
27
27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建筑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第一辑

国家建工总局办公厅政策研究室 编



工业出版社

638456

目 录

经济工作必须掌握经济发展规律	(1)
我国全民所有制经济计划管理体制	
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方向	(24)
必须加强基本建设技术经济的研究	(43)
南、罗、匈、苏四国经济管理改革的一些情况	(66)
匈牙利“新经济体制”简介	(86)
关于苏联基本建设体制的一些情况	(101)
关于逐步实现建筑工业化的政府政策和措施	
的指南(摘要)	(114)
日本建筑业的情况	(137)
波兰住宅建筑的发展情况	(145)
香港的建筑业	(151)
略论战后日本企业管理问题	(157)
日本的质量管理	(185)
日本企业的职工培训工作	(197)
战后日本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选拔和培训	(205)
编者说明	(222)

经济工作必须掌握经济发展规律

薛 暮 桥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在国家经委
企业管理研究班的报告）

去年十月，我在国家计委做过一个学术报告，题目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报告印发的份数不少，有些同志可能已经看过。没有看过的如果愿意看，找一份也不难。所以，凡是上次报告中讲过的话，我就不讲或者少讲。前次的报告问题提得很多，讲得不深不透。这次集中讲几个问题，凡是人家一讲再讲的问题（比如按劳分配），我也尽量少讲。今天只讲三个问题：

（一）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都设想，无产阶级革命会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且有可能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这些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如果这样，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就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可是历史发展是曲折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中等发展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而且是一个国家单独取得胜利。列宁并没有象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头子那样，凡是马克思、恩格斯讲过的话，都句句照办，而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说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胜利。既然历史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无产阶级在俄国有可能夺取政权，那末无产阶级究竟先夺取

政权，在无产阶级政权下来发展经济和文化，还是放弃夺取政权的机会，等经济文化充分发展以后再来夺取政权呢？列宁是选择了前一条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此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实践，已经证明列宁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在一个小农经济还占优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会遇到一些马克思所没有预料到的困难的。例如，如何对待小农经济。列宁由于缺乏经验，在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几年，曾经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并且曾经设想可以比较快地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走了一段弯路。当时农业生产大幅度地下降，固然同战争有关，但政策违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列宁善于总结经验，改正错误，从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准许农民在交纳了农业税后，多余的粮食可以在市场自由出售，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这和我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农村所实行的政策是基本相同的。

社会主义当然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下一步怎么办？列宁提出了通过合作社来改造小农经济的方针。但列宁逝世太早，在他逝世以前，小农经济的合作化仅仅作过一些试验。而且他已在病中，对于小农经济如何合作化，特别是合作化后所出现的问题，无法作出具体指示。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遗志，完成了农业的集体化，在他晚年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存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这两种公有制之间还必须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价值规律还要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善于利用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新的发展。但斯大林的思想还有局限性，他只承认价值规律对消费品的流通过程还起调节作用，不承认它对农业生产还起调节作用。因此一直把粮食的征购价格压得很低，竭泽而渔，直到他逝世的时候粮食生产还没有恢复到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1953年苏联粮食产量按人口平均低于1913年。

历史的发展愈走愈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也取得了

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太幼稚、太软弱，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胜利。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苏联不一样，苏联主要是靠无产阶级自己，在城市中实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然后使革命从城市发展到农村。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很薄弱，主要只能依靠农民，首先在乡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用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毛泽东同志为贫穷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民主革命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占绝对优势。在这样的国家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又向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在没收官僚资本，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以后，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比较，在经济上也占优势地位。问题是小农经济这个汪洋大海，谁能够把他们领导起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掌握了对小农经济的领导权，谁就能够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中国党和苏联党不一样，我们是主要依靠农民，在农村中战斗了二十二年才取得革命胜利的。所以我们党不但在政治上巩固地团结了农民，在经济上也有一整套领导小农经济的办法。列宁看到小农经济很分散、不好管，因此他说对付小农经济比对付资产阶级还困难。1918年上半年和1921年列宁都曾经提出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同农民的自发势力作斗争。这条路走不通，才采取通过市场，用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办法领导小农经济，因此号召共产党员努力学习商业。我们党对这个问题早已有一套成熟的经验，懂得小生产者（主要是农民）都要依靠市场。过去资产阶级是通过市场来领导和剥削小生产者的。但是由于十几年的战争和通货膨胀，城乡交流严重破坏，资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系也大大削弱了。我们党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在农村中广泛建立供销合作社，一方面收购农民的农产品，另一方面又供应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这样既把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起来，有利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又把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大大地削弱了资产阶级同

农民的联系。列宁认为最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在一开始就顺利地解决了。

接下去的一个问题，是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小农经济，能不能象苏联那样实行合作化，也就是说实行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有人主张先机械化，后合作化。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我国的情况下，必须先合作化，才有可能机械化。事实很明显，我国一个农户只种十亩地（同美国一个农民种一千亩地不一样），不合作化，怎样能够机械化呢？实践已经证明，毛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太落后，我国农业的合作化，开始一个时期是很谨慎的，从劳动互助、初级合作社逐步地发展到高级合作社，而且计划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逐步完成。1955年以后，前进的步伐太快一点，1956年就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合作化。当时大家还在摸索经验，比较稳重，所以农业生产还是逐年上升的，没有象苏联那样在集体化过程中出现农业生产的一度倒退。

在合作化胜利完成后，大家的头脑就热起来了。实际上1956年许多合作社只挂上一块牌子，真正完成合作化是1957年。可是1958年有几个省就办起人民公社来了，不到半年就完成了全国的人民公社化。生产关系的这样大的改革，没有象合作化那样创造典型，逐步推广，而是一道命令办起来的。当时大家没有经验，办了人民公社，许多地区就以公社作为统一的核算和分配单位。有些县还办了“县联社”，全县统一分配，实际上取消了集体所有制，乱子就闯大了。由于刮共产风，公社共生产队的产，穷队共富队的产，有些地区还叫“放开肚皮吃饭”，三个月就把一年的粮食吃光了。许多生产队被迫起来自卫，用“瞒产私分”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年十二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人民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决定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的觉悟程度，不能想早就早。但是错误地估计了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有些地方只需要三、

四年，有些地方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决议没有指出人民公社要实行三级所有制，事实上是承认公社统一分配。决议还提倡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等等。

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什么一下子把这优良作风丢掉了呢？我看一则因为合作化完成很快，过分夸大了改变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作用，忘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条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二则对粮食产量估计过高，刮了“浮夸风”，《人民日报》多次用红字报导某某地区一亩地一季生产粮食七千多斤，还是某某书记亲自验收的。这一年各省报来的粮食产量有一万多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增加了两、三倍。当时许多同志都不信，不敢讲。开统计局长会议的时候好几个省来找我，说粮食数字是假的，钢铁数字是假的，省委逼着要报，不报不行。有的统计局长不肯跟着说假话，省委批评他反对“大跃进”，撤职，开除党籍。既然农业生产增长这样容易，当然三、四年，五、六年就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十五年、二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

毛主席在1958年底和1959年初发现出了这个问题，1958年11月开郑州会议，12月开武昌会议都是纠“左”。他在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批评了“共产风”，指出人民公社应当实行三级所有制，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为核算的基础。但当时各省弯子一下转不过来，有些省还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些省虽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但一个生产队有三百多户，比现在的许多大队还大，仍然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1959年粮食产量比1958年显著下降，1960年和1961年继续下降，出现了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生产关系变得太快，和生产力的不相适应是一个重要原因。1961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人民公社《六十条》，先是取消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接着又明确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且把生产队缩小到只有三、四十户，而且说三十年不变。

人民公社经过两次后退，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以1962年《六十条》一公布，加上其它一些措施，农业生产就开始回升了。

这一段沉痛教训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客观经济规律是不能违反的，违反了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使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有些农村里还饿死了不少人。在生产力这样低的农村里，不可能建成象马克思、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他们说的是“全社会公有制”，也就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我们现在在农村还只能建成集体所有制，这是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各个集体经济单位还各自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还没有完全消灭私有制的痕迹。不仅如此，我们的人民公社还只能实行公有化水平很低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而且还必须保留一点自留地、家庭副业等个体经济的残余。二十多年来，我们许多地区急于过渡，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都受到历史的惩罚。由此可见，在贫穷落后的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容易的，要建设象马克思、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没有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国的农村还是半自给经济，种出来的粮食约有四分之三是供农民和生产队自己消费，各集体经济单位经济上的联系不大，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由国家来统一管理。在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后，情况就不同了。不但各集体经济单位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同国营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日益密切，维持现在这样的情况就不可能了。

现在很有必要总结一下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提高到路线和理论上来认识。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几次犯错误，究竟是右的错误，还是“左”的错误呢？是右倾保守的错误，还是急躁冒进的错误呢？右的错误是有的，如五十年代前几年两次大砍合作社，1961年～1962年的包产到户。但纠正很快，损失不大。包产到户还是前几年急躁冒进，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克服困难的权宜措施，谁也没有把它当做长期方针。急躁冒进的错误，虽然1959年2月毛主席就批评了，但是为怕伤害“三面

红旗”，纠正错误行动迟缓，到这年夏天庐山会议又来一次“反右倾”，把许多过去敢于说真话、提意见的同志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职，下放劳动。而在“三年大跃进”时期说大话、说假话的人，则被认为“拥护三面红旗”，受到表扬。多年来一直是只准反右，不准反“左”。因此，“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就代替了延安整风时期树立起来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林彪、“四人帮”就是利用这点，为篡党夺权，在党内推行一条极“左”路线。直到“四人帮”被揪出以后，许多同志仍然不能从老框框中解放出来，仍然坚持要把林彪、“四人帮”的错误说是“极右路线”。这几年落实党的农村政策，显然是反对极“左”路线，但我们报刊上还在批评“极右路线”。这就难怪许多农村干部心有余悸，说“是不是刘少奇又回来了”。不澄清路线是非，怎么能够落实党的路线政策，怎么能使全国人民和外国朋友相信现在我们党的路线政策能够坚持下去呢？

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不是只会发生右的错误，不会发生“左”的错误，这同下面一个理论问题是有密切关系的。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在关于党中央的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说，在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决议是大会一致举手通过的，但此后不久，这句话就受到批评。许多批评文章所持的理由是，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它总是跑在前面，因此只会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矛盾，不会有生产关系改变过急，脱离生产力水平的矛盾。可是回顾我们的历史，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几次犯重大错误，都是生产关系改变过快过急，破坏生产力，逼着我们不能不让生产关系倒退几步，来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犯了错误以后，在实际行动中退回来了，我们仍然不懂得必须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向马克思所要求的社会主义逐步前进。恰恰相反，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巩固的原因，完全归咎于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因而用扩大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办

法来巩固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尚且不可避免地要存在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在我国现在的农村中，怎能够没有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呢？不保留一点资本主义或者小农经济的残余或痕迹，就不可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以，每搞一次大反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生产力就受到一次破坏，结果是资本主义愈反愈多，社会主义愈干愈少。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使农民能够依靠集体经济，生活一年一年富裕起来。现在许多地区农民生活水平很低，依靠集体经济保障不了最低限度生活需要，只能靠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来补充。这种情况不改变，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很难巩固，更不能向前发展。过去许多同志受“四人帮”的毒害，不怕农民太穷，而怕农民太富，怕农民富了要产生资产阶级，只有穷了才能够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生活应该超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够象现在这样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如果社会主义不能保障劳动人民过富裕生活，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在哪里，劳动人民为什么要拥护社会主义呢？所以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确实存在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光搞阶级斗争，主要靠发展生产力，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二）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按比例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目的是要满足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人民的生活需要是不断提高的，所以经常存在着社会生产满足不了社会需要的矛盾。特别是象我们这样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的国家，这个矛盾更加突出。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使生产高速度发展。马克思说，要扩大再生产，就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就优先发展重工业。所以斯大林在进行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时，特别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重工业发展太快，必然要妨碍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不仅由于发展重工业要占用许多劳动力，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从哪里来，只能挤农业和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受挤，发展很慢，人民生活没有保证，重工业想上也上不去。

三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要保障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安排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1956年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早就批评了斯大林只重视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错误。批评是批评了，但照样犯错误，犯得比苏联更严重。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很顺利，就错误地估计国民经济将有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跃进。1955年公布的农业发展纲要原来要求十二年（1967年）完成，许多地区要求三年、五年完成，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措施（如1956年制造几百万个双轮双铧犁等），这在当时是显然做不到的。《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说人们不能胡思乱想，勉强做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这篇社论受到了严厉的批评。1958年春节召开批评“反冒进”的紧急会议，规定以后不准再“反冒进”。批评“反冒进”的结果，1958年就不实事求是了，搞了高指标。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农业生产增长都是相当快的，而且比较平稳，逐年增长。这五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18%，其中重工业年增25.4%，轻工业年增12.9%。农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4.5%。总的来说，重工业快了一点，农业慢了一点，但还没有出现比例失调的现象。1958年上半年工农业生产本来形势很好，钢产量原来计划620万吨，经过努力可以达到700万吨。冶金部提出要增加到800万吨。这年北戴河会议，有些同志看风驶舵，提出要比1957年（535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粮食更离奇，天津郊区新立村有块试验田说要亩产十几万斤，其它田地亩产五千斤到一万斤，每天有几千人去参观。多数人不相信，不敢说，怕被戴上“反冒进”的帽子。其它地区也不甘心落后，全国各省所报粮食预计产量超过一万亿斤。北戴河会议信以为真，估

计这一年粮食的产量至少可以达到7,000亿斤，并把7,000亿斤粮食和1,070万吨钢的数字在报纸上公布了。

为着力争完成1,070万吨钢的任务，各省一下子建起了几万个小高炉。后来发展到用砖瓦石灰窑炼铁，土法炼钢，公开弄虚作假。《人民日报》天天宣传“小土群”、“大土群”、“放卫星”的神话，刮起了说大话、说假话的十二级大台风。这年秋天召开电话会议，督促各省完成1,070万吨钢的任务。当时陶铸同志在电话中说，“小土群”、“大土群”炼出来的铁毫无用处，白白浪费原料燃料，建议降低计划指标，否则大家就只能弄虚作假。但作结论时候，说1,070万吨钢已经向全世界公布，必须完成，对弄虚作假避而不谈。1959年初公布，1958年的钢产量达到1,100万吨，超额完成。实际上能用的钢只有800万吨，其中还有40万吨没有达到原来的质量指标。粮食产量公布7,000亿斤，1959年经过核实减为5,000亿斤，1961年再一次核实只有4,000亿斤。

这时大家仍在刮浮夸风，1958年冬各省汇报1959年的钢产量计划达到3,000万吨，计委把它压到2,000万吨。陈云同志看了不放心，亲自到计委来开会，说能搞到1,600万吨就很好了。但是大家听不进去，结果决定对外公布1,800万吨，内部安排仍定2,000万吨。过了两、三个月，看到1,800万吨完成不了，1959年3月底上海会议，就改为1,650万吨。当时计委有些同志就说1,650万吨也是做不到的，但再降下去就不好交待了。毛主席在会上批评“我怀疑你们这些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否真正懂得经济”，要陈云同志再研究，陈云同志建议降到1,300万吨。这年八月，周恩来同志在全国人大常委报告，建议修改计划统计数字。钢产量1958年的统计数字改为800万吨，1959年的计划数字改为1,200万吨（比1958年增加50%）。粮食产量1958年的统计数字改为5,000亿斤，1959年的计划数字（原为10,500亿斤）改为5,500亿斤。这一年，钢产量经过蛮干，勉强超过1,300万吨；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百分之十五。

1959~1961年三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当时说是由于严重

自然灾害。现在看来，主要由于前面所说刮了“共产风”，其次由于刮了“浮夸风”，产量估计过高，征购过多，伤了元气，农民吃的口粮不够，饿着肚子没有力气种田，加上“一平二调”，积极性也大大下降。到1962年公布人民公社《六十条》，并减轻征购任务以后，农业生产才开始回升。

1959年起农业减产，接着轻工业也跟着下降，重工业应当跟着降下来。可是庐山会议批了“右倾机会主义”，越批越“左”，1960年又定了1,800万吨钢的计划，比1959年又增加将近500万吨，比1958年增加1,000万吨。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薄一波同志要我写一个“一年来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我召集计委、经委、统计局的同志讨论，提出钢产量每年增加500万吨太多，只能增加300万吨；粮食增加500亿斤太多，只能增加300亿斤（这可能也过高了）。而且还说了一年来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只重视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重视多快，不重视好省；只重视主观需要，不重视客观可能；只重视突出重点，不重视照顾全面；只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重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我在经委党组做了两次检讨，由薄一波同志保护过关。参加讨论的计委、经委几个同志都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在这以前，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国民经济的高速度、按比例发展》，说了高速度必须按比例，也被批评是反对“大跃进”。1961年李富春同志出来说话，说计委、经委的同志必须说真话，要让大家提意见，不能乱戴帽子，把错戴帽子的同志一律平反，而且向他们赔礼道歉。

陈云同志当时兼任建委主任，他在1959年就主张降低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但是大家听不进去。不吃一点苦头，发了热的头脑是冷静不下来的。当时经委在“反右倾”的压力下，继续大鼓干劲，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等口号，力争完成计划指标。结果钢产量超过1,800万吨，煤产量超过39,000万吨，但这是打“消耗战”，取消了机器设备的定期检修和减少了煤矿的巷道掘进排出来的，吃了老本，挤了别

人，因此1961年就垮下去了。1960年夏，李富春同志看到农轻重比例失调，这样再搞下去不行了，叫我起草一个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建议。周恩来同志很重视富春同志的建议，把“调整”扩大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年冬经毛主席批准，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了。可是已经晚了，历史仍在无情地惩罚我们。

1961年和1962年重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钢产量1961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五十多，1962年又下降百分之二十多。煤产量1961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1962年又下降百分之二十多。基本建设投资，1959年和1960年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和百分之三十二，1961年和1962年分别占国民收入百分之十二点三和百分之七点四。生产和建设这样大起大落，这说明我们的国家计划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犯了严重错误。

早在1956年夏天，就在周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亲自领导（当时李富春同志在苏联）下制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周总理要我们估计第二个五年的生产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总额，安排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计算五年投资总额，安排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经过反复讨论，决定积累率是25%，规定1962年钢产量增加到1,050~1,200万吨，粮食增加到5,000亿斤。这个计划建议经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现在看来，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如果按此执行，国民经济的发展会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更好。可惜的是，1958年头脑一热，就把《二五建议》完全抛开了。重工业生产三年大跃进，两年大倒退；农业生产从1959年起就倒退下来，因此到1960年就农轻重关系比例失调，人民生活遇到三年相当大的困难。如果认真执行八大所通过的《二五建议》，那就决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1961年在周总理和陈云同志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陈云同志1961年到青浦去蹲点研究农业生产下降的原因，接着又花两个月时间召开煤炭、钢铁和机械座谈会，研究重工业生产下降的原因，并研究采取各种具体措施来解决人民生活

和市场供应的困难。这个时期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

第一是下决心精减职工，把两千万新从农村招来的职工退回农村中去，从吃商品粮的劳动者变为生产粮食的劳动者。从1958年到1960年，由于工业生产发展过猛和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新增加职工2,550万人，与此同时，农业劳动者减少2,300万人；加以农业农田水利建设规模过大，参加当年生产的劳动力严重不足。1958年秋粮食熟了没有人割，棉花掉在地上没有人拣，丰产不丰收。两千万劳动者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由于安排得好，没有什么地方闹事。正如毛主席所说，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谁能办得到。这是一个英明决策。

第二是下决心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上万个大小建设项目停工下马。陈云同志建议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要“先生活，次生产，后基建”。毛主席也说，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1962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大约比1960年下降80%。有上万个半拉子工程停工或者报废，损失是十分严重的。但不这样做不行，一则财政部没有钱，二则有了钱也没有机器设备和建筑材料，而且许多工程没有科学设计，建成了也会年年赔钱。我们花了几百亿元学费买到了这样一个沉痛的教训，可是因为不敢批评“大跃进”，“伤口好了忘了痛”，经济一好转又要“反右倾”。所以年年说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战线还是愈拉愈长，直到现在这个毛病还很不容易改过来。

第三是下决心缩短重工业生产战线。当时重工业生产想上也上不去，因为经过几年蛮干，机器设备严重破坏。而且要炼钢铁，没有煤炭，连鞍钢的大高炉也一半停产。煤矿呢？不但机器设备破坏严重，而且巷道掘进欠了账，一、两年还不清，所以比钢铁恢复还慢。能不能下降得少一点？办法有，就是要停几万个小高炉，省出煤炭来保鞍钢等大高炉。可是许多同志反对，说停小高炉是路线错误，非保不可。我们在周总理领导下，为中央财经小组起草一个文件，提出要“保一批，停一批”。凡是产品质量

量差，原材料、燃料消耗大的工厂，要“关、停、并、转”。总理叫我带着这个文件，到杭州去向陈云同志征求意见。陈云同志完全同意。回来后由总理审阅修改后发出去了。但这文件一直挨批，文化大革命中大批“下马风”，名为批刘少奇，实际是批周总理，因为他们也知道是在周总理领导下起草的。

经过大幅度的调整，1963年工农业生产就开始回升。在制订1964年计划时，计委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说调整工作已经完成了，一种是说没有完成，还要继续调整。向周总理报告时，周总理不但肯定了后一种意见，而且说要调整三年，到1965年才能完成。现在看来，周总理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钢和煤的产量到1965年、1966年达到正常的生产水平。现在做经济工作的同志都说，1965、1966年的工作最顺利，原因是经过1961、1962年的大调整，恢复了比例关系。

我所以花这样多的时间来讲“三年大跃进”和“五年大调整”，目的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要高速度，就必须按比例；要按比例，就必须有正确的、符合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国家计划。计划不但不能有缺口，而且必须留有余地，以满足原来没有预料到的计划以外的需要。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基本上是遵守客观经济规律的。1958年头脑一热，把这些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批评这是“消极平衡”。

“积极平衡”是“以钢为纲”，挂起一个毫无实际根据的1,070万吨、1,800万吨钢的高指标，要大家向它看齐，逼得大家都提高指标。为着保证这些高指标，就拉长基本建设战线，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对于这一段的经济工作，历史本来早已做了总结。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把错误的说成是正确的，把正确的说成是错误的。直到揪出“四人帮”后，大家还把这几年的历史当做“禁区”，不敢碰。因此有许多错误，现在还改不过来。看来总结这八年的经验教训，很有必要。现在国民经济仍然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和重工业战线仍然拉